

著——舒晋瑜文学访谈录

说吧， 从头说起

作家出版社

说吧， 从头说起

著——舒晋瑜文学访谈录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说吧, 从头说起 / 舒晋瑜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4. 2

ISBN 978-7-5063-7257-2

I. ①说… II. ①舒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03193 号

说吧, 从头说起

作 者: 舒晋瑜

责任编辑: 李宏伟

装帧设计: @申设计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305 千

印 张: 22.5

版 次: 2014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257-2

定 价: 3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阿来：

我希望通过写作自我修复 · 1

陈忠实：

我早就走出了《白鹿原》 · 31

迟子建：

我热爱世俗生活 · 47

方方：

优秀的作家应该坚持为内心写作 · 69

格非：

作家一生只在写一部作品 · 93

韩少功：

外圆内方与识圆行方 · 115

何建明：

我在努力和挣扎中期待 · 135

贾平凹：

我想能尽力有中国气派 · 159

李佩甫：

不拉开距离就不可能看清楚脚下的土地 · 187

莫言：

土，是我走向世界的原因 · 207

苏童：

尖叫的孩子和迷人的品质 · 234

铁凝：

文学最终要向世界传达体贴之情 · 251

王安忆：

下笔要谨慎，是我写作多年的经验 · 273

王蒙：

作家首先是个感受者和表达者 · 289

严歌苓：

在美国当作家没有优越感 · 309

张炜：

杰作不一定为文学史而写 · 327

阿来：我希望通过写作自我修复

采访手记：

有时候，他是个纯粹的诗人，他的诗歌寂静丰盈，没有半点杂质；有时候，他是个摄影爱好者，装备和作品不亚于专业摄影家；更多的时候，他是写作者，只听从于内心的召唤，心无旁骛。

当然，他也会半是神秘半是得意地告诉你：写作，那得靠天赋！

他的身上，有一股子拧劲儿。比如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《尘埃落定》，当年虽屡遭退稿，却坚定不移地告诉编辑：可以改，我只改错别字。

当然，他也明白什么时候不该“拧”。他不跟自己的内心拧，并且强调，再拧也拧不过命运。“我们有点听天由命——听起来会让人感觉有点消极，但是人的命运有一个大的定数，人都是有命运感的，有自然神性的东西支配它。”

阿来的老家属于藏区，出门就是大自然。但是他很少享受这些美好，生活中留下的温暖的记忆并不太多。

舒晋瑜：最早留在记忆里的家乡是什么样子？

阿来：我对家乡的记忆可不好。我们那个年代，农村出身的话，肯定是

比较沉重的记忆。大部分农村都一样，太穷困。跟乡土文学中描写的农村不一样，乡土文学里农村有着像乌托邦一样美好的田园生活。

但是也有美好，就是自然界的。可能跟我生活的地区有关，老家那一带属于藏区，没有完全上升到高原，有草地、森林、河流，自然环境优美。前后十多里地就那么一个小村庄，出门就是大自然。但是因为贫困很少享受这些美好。而且生活中留下的温暖的记忆不太多。

童年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，定然深刻地影响到作家及其作品；文学既基于个人经历和感受，又要超越这些。

舒晋瑜：这么多年来，对家乡的印象也不停地变化吧？您有36年的时间生活在那里。

阿来：我也巴不得每次回去都有感觉。但是太熟悉了，路上哪里有弯道，哪里有棵大树，都太熟悉了。我不断地回去，不断地对她有希望，希望她变得好，这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希望。但是回去也是很正常的来来往往，不过是一天的车程，不能说一抬脚就到，至少油门一踩就到了，没有什么依依不舍。

这也是中国文学中有趣的问题：把故乡的依恋渲染到难以割舍的程度。我不太相信。

很多人一生的努力就是离开乡村。当然会有某种特殊的感情，大概也和古代文学传统有关。在古代，因为交通问题或者其他问题，可能走一次就不回去了，有的像贺知章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”。我常想这个事情。古人还可以理解，今天的人们再这么表述就有些夸张了。

舒晋瑜：但是您依然称故乡为“肉体与精神的原乡”，您觉得，在自己的写作经历和人生经历中，故乡给予您怎样的滋养？

阿来：对于我精神的养成、性格的养成、对世界的看法，都有非常深的影响。这也是今天想超越自己的一个原因。如果还想有新的认知，不能老在现有的水准上，离开那个乡村，对农村出生的人来讲，都有改变自己生活的动机。

除了对我精神气质上的陶冶，更重要的是，使我有了一个立场，不管离开再远，可能我们出生底层，坚持这种立场的人不太多，我还是会站在他们的立场。

在城里，尽管各方面条件都还好，但人们有时候还有不满足，而且我们的不满足比底层人民的还多。我就常常警醒自己，想想我的父辈，我的同时代还待在农村的人，一切都释然了。我们应该少追求些物质利益，多做些精神上的坚守。

藏族的血统来自母亲，父亲是回族商人的儿子。阿来出生与生活的环境是大渡河上游的“嘉绒藏族”村庄，属川藏高原的一部分，这里的藏族人民世代代过着半牧半农耕的生活。他的每一部作品，都与故乡有关。

舒晋瑜：您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是个传统的藏族村落，藏族文化和传统对您的人生有何影响？这种人生经历对您的写作有何帮助？

阿来：人都是这样，要表达情感，也要传承集体记忆，一个村庄一个家族都有它的英雄人物，也有很多传奇需要人传颂，更多的是通过故事的方式。我听过很多，主要还是口传的、歌唱形式的。

过去精神更多指向于宗教，我已经从那个环境中出来，精神指向是多方面的。文学也是自我完善、自我教育的一个方式。

舒晋瑜：您的作品主要是写藏族历史，写藏民生活，是希望大家通过您的作品更深入地了解藏族文化和藏民生活，还是只是出于您个人的写作习惯？

阿来：这就是一个人的气质性，我自己写作的时候，更多的是表达自己。当然客观上可能会有这样的效果。

舒晋瑜：作为一个藏族作家，我猜测您更多的是从藏族民间的神话、部族传说、家族传说、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。但是我记得，您说过自己印象最深的作品是《聊斋志异》。

阿来：我们喜欢复杂的东西，包括批评家们也喜欢复杂的东西，把一部《红楼梦》分析来分析去。世界上的东西都是这样，大家都说好的东西不见得那么好，说不好的东西也未必就不好。《聊斋志异》精灵剔透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其实汉语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。我也读了明清笔记，更不要说散文诗歌。《庄子》里头也有表达很好的修辞，当然主要目的不在文学上，而是对哲学的诠释。

藏族没有纯粹的书面的独立语言。书面表达不发达的地方，往往口头表达很发达。我更多地是受口头文学的影响。在我们生活的地方，大部分人没能上学识字，有点像回到百十年前的中国，国语还没有推广，生活在方言的世界里。所以书面语言系统对普通人的影响不大。

阿来初中毕业开始务农，在阿坝州的水利建筑工程队当过工人，开过拖拉机，还是个合格的机修工。恢复高考，使阿来得以在马尔康师范学校学习，并当了五年的乡村教师。

舒晋瑜：您是从二十二岁才开始写作的？第一篇作品是什么？有关故乡吗？

阿来：后来有了正式的工作，生活安定下来才开始写。上世纪80年代文学热，我的周围很多人在写。第一篇作品是写草原的。

舒晋瑜：您的成名不算早，《尘埃落定》出版时已36岁，而且出版的过程也不顺利。您觉得前期准备的过程，对自己而言是种折磨么？

阿来：之前写过很多，不是很差，但是很多编辑拒不承认。《尘埃落定》发表是在1998年，我准备了十来年。过程并不折磨，看你的目标。不能说写作没有一点功利之心，也希望通过写作改变命运。但是写作本身、阅读本身是这么有意思的事情，本身就充满乐趣。我常常讲，写作要有乐趣，阅读要有乐趣，如果写完小说就住院了，如果是这么苦的事情，我就不干了。

舒晋瑜：当年《尘埃落定》写出来，遭遇过很多退稿？

阿来：稍微像样一点的出版社都投过稿。也不是直接退稿。编辑说你改吧，一二三提了很多意见。我那时比现在说话还冲——《尘埃落定》可以改：只改错别字，因为我不能保证我每个字都敲对。

舒晋瑜：为什么会这么自信？

阿来：写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读者，读了那么多书，我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。很多不出名的人，为了能够出书或者出名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很多人因此把自己的作品改得面目全非。

从处女作开始就被“退稿”，阿来走上文坛初始并不顺利。他倒觉得这是好事，尤其是对年轻人，这样更接近文学本质，会回过头来在文学上下更多的功夫。

舒晋瑜：这样的倔强，是否在文学作品的发表上走了很多弯路？

阿来：很多人走了捷径，找到知名的人把自己引荐到圈子里来，我也经常听到身边有人说，到北京去了，认识谁了。上世纪80年代，很多作家都上了作家班，文坛作家们于是有了“同学聚会”，北大作家班、武大作家班，以及鲁迅文学院等等。我不报名，也没有这个要求。我觉得那些内容通过自学就可以达到。不像理科，必须在某个国家的实验室才能学到。我就想自己学，剩下的东西就是人际网络的建设。我觉得我不追求这个。

舒晋瑜：可是，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，文坛也不能出其左右。

阿来：我觉得没关系。我从来只问一个根本的问题：为什么我做文学而没有做其他，我有很多选择的机会。选择文学，不伤害我的自尊。我本来是为了活得干净一点干这么一件事。选择写小说，就觉得这是可以靠个人能力达到的。如果见了谁还要点头哈腰，我早就放弃了。和我一起写作的都走红，我还默默无闻。虽然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，但是因为不在那个“圈子里”，即便有作品发表大家也不大谈论我，会“假装”我不存在。我不服气，

一定坚持靠自己打拼会在文坛有立足之地。

阿来没有料到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网络支撑的社会，完全凭自己陌生的面孔打出一片天地确实很难。同时写作的人二十多岁就出名了，阿来一定得到十年以后。

舒晋瑜：2000年《尘埃落定》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消息是南京书展上得知的？

阿来：《科幻世界》刚创办了一个子刊，我参加了南京书展，主要精力放在新杂志在订货会首次亮相的推广上，想赶紧拿个几万份的订数。接到获得茅奖的电话通知，我当时都没反应过来，等忙完以后，一想，咦，得奖了。

舒晋瑜：可是当时媒体有报道是“阿来做好落选茅盾文学奖的准备”。

阿来：本来前后并非同一个话题。因为初选的结果我是全票，自然有人问我得奖是否没问题了？我说，去年也是全票，但未必得奖，我有落选的思想准备——就这么简单。有些媒体报道是很可怕的，把前边掐掉，后边掐掉，孤零零只留一句，特别显得我自作多情，或者对奖项不满。

舒晋瑜：无论如何得奖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。

阿来：当然我肯定高兴。喧喧嚷嚷几天就过去了，该干嘛干嘛。我最高兴的是写完一部作品最后一个字的时候，尤其是《尘埃落定》，写得很轻松、很酣畅淋漓，写完后有一种幸福的感觉。其间有很多高兴的事情，写完后高兴，出版了高兴，出版后通知加印又高兴。出版社、作协通知我这本书送去评选，我高兴，媒体透露初评得了全票我也高兴。有次我打了个很不恰当的比方，有点像结婚，入洞房当然高兴，但是更高兴的是第一次拉手，第一次kiss的时候，我更看重这个过程。

舒晋瑜：听说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印5万册还有些故事？

阿来：后来稿子转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脚印手里，说可以出版，社里答应印一万册，这在当时已经是个非常大的数字。脚印认为可以印五万册，就找到当时的发行部副主任兼策划部主任张福海（现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司司长），极力推荐这本书。张福海回家一口气看到凌晨4点，看得泪流满面。第二天他去找社长要求印五万册。社长问：“赔了怎么办？”他说赔了扣奖金！社长说：“奖金也不够呢？”他说：“那就扣工资！”最后社长答应首印五万册。

舒晋瑜：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历届茅盾文学奖中最好的作品之一。当时评委会给出的评价是，“小说视角独特，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。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”，语言“轻巧而富有魅力”、“充满灵动的诗意”，“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”。《尘埃落定》的出版，在当年甚至被视为一个事件。

阿来：很多评论家自发地写评论文章，那时我一个评论家都不认识。我很怀念那时候的文学氛围。

《尘埃落定》十年后，阿来才推出第二部长篇小说《空山》，可谓“十年磨一剑”。如果说《尘埃落定》是封闭的结构、完整的故事，《空山》则是一部结构机巧、以六个大中篇构成的“橘瓣式”长篇小说。

舒晋瑜：在写完《尘埃落定》之后，您有六年时间一个字都没写。当时您打过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比喻：“就像一个人刚轰轰烈烈地谈完一场恋爱，让他马上跟另外一个人再这么铭心刻骨地恋爱做不到。”但是《空山》系列写完后，《格萨尔王》的创作并没有间隔太久。写作时那种“恋爱”的感觉还有么？

阿来：我自己对于写作，还是认真地写。不仅是智力的投入，还有情感的投入。当然也有控制。《空山》对我来说，太长了，到第三部的时候，我

巴不得快点结束。当然结束的时候，还是回到了沉重的现实，面对那些我熟悉的人，更把我童年少年的记忆中不太愉快的一面激发出来了——花草是激发我记忆中美好的一面。

《空山》写到三分之一或一半的时候，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。心中有完整的轮廓和人物的形象，剩下的就是在字数上的完成，所以不影响下一本书的准备。《空山》写到最后心情过于抑郁，我就上高原了。上高原有两件事，一是中止写作，二是研究植物。边写《空山》，边搜集格萨尔王的故事。《格萨尔王》需要学术上的准备，需要调查考证，需要感性和理性上的回归。写完《空山》，马上进入了《格萨尔王》的创作。

写作需要训练自己，作家也要不断调试自己。我一直在关注古典文学、西方文学创作中始终高产且高质的作家是怎么做的，像苏东坡、杜甫、托尔斯泰、福克纳……他们的写作持续能力很强。尤其很多西方作家，一生都在写作，写得都不是很差。

我发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调试，他们是把写作融入到生活中去，而不是写作和生活截然分开。应该研究他们的作品，分析他们的写作方式和生活方式，让我们的艺术生命长一些，别昙花一现，也别像过山车，上头和下头差距太大，大得让人吃惊。

舒晋瑜：这是个非常独特也很实际的研究课题啊！

阿来：也是我经历的一个问题。我的前半生，写得少，或者说在学习写，后半生要靠这个过日子。物质上是，精神上也是。

舒晋瑜：您会藏语和汉语，也许还会英语，懂多种语言对于写作有帮助么？

阿来：大家表扬我说，阿来用的汉语非常好。我相信和汉语作家比没什么惭愧的，甚至有骄傲的理由。我不太相信一个作家主观上对语言不重视。但是长期浸泡在一种语言中，太熟悉了，熟悉到看不到它的优点。

懂得两种语言，很容易地，两相对照，另一种语言的特点会呈现出来。

长期浸泡不太容易意识和发现语言的优点。

舒晋瑜：无论诗歌、散文还是小说，您的语言都特别优美而且充满诗意。

阿来：这也是我希望的。汉语这种文字，承载了古典文学中传承下来的那么多诗学美学的东西，没有理由不让它美。

我精心对待文字，也是我对语言表示尊重和敬意。说是没用的。爱什么东西，就在还拥有它的时候珍惜它。文字也是如此。

舒晋瑜：我们常常是说到爱情时才这么表述。

阿来：爱情只是针对一个人——当然也要珍惜。但文字是针对无数人。

《格萨尔王》被誉为阿来为藏族人民“写心”之作，是“一本让你读懂西藏人民眼神的小说”。

舒晋瑜：《格萨尔王》是属于“重述神话”的一本。当时为什么愿意接受这个“命题作文”？

阿来：其实是两相结合。刚开始做“重述神话”时重庆出版集团就找过我，当时没有答应，因为当时刚开始写《空山》，不太可能腾出手来做另一件事情。另外也不确定写什么，《格萨尔王》也不是他们的命题。《空山》差不多了然于胸，快完成时，我去青藏高原没有目的地旅行。过去接触《格萨尔王》，更多的是案头上的。后来是在藏区，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民间艺人，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，我找到了入手的方式，不然简单的重述也没有太大意思。想法成熟的时候，恰好他们又来找我。

“重述系列”有一些要求，字数不能超过十六七万字。我说这个事情不行，不能削足适履。我不反对小说写得精练。但是太精练了就是干巴骨头，像博物馆的恐龙化石，读者也不愿意看。我们写小说，除了喜欢写，除了大家看到的好处外，还有写作的过程有点high，有点过瘾。如果别扭，就不写小说了。

写作更多依赖天赋。阿来自信地说：“我相信上帝造人就造成了不同的人。造我们就是写写小说。当然天赋还不够，还需要不断地提升，提升自己的修持。”

舒晋瑜：德语出版社出了《遥远的温泉》单行本，在国内出版过么？现在您的作品版权输出情况如何？翻译最多的版本是哪一本？

阿来：国内没有单行本。这本书是2003年写的，在《空山》之前，销量排在当年小说排行榜的前一两名。现在翻译最多的应该还是《尘埃落定》，《空山》前一二卷也出版了，第三卷正在翻译，长篇散文《大地的阶梯》和《格萨尔王》也快出版了。基本上都是国外的汉学家在翻译，英文版主要是葛浩文翻译。

我有个美国的代理，我授权的语种有十几种，其中塞尔维亚语等小语种也有了。现在大概有二十多个国家出版，大语种里只差被翻译成俄文。

我的作品在美国、法国、德国销量比较好，从读者反馈情况看，德语版可能更接近我的本意。

舒晋瑜：我一直在想，是什么成就了阿来，是这方水土还是后天的努力？也许很大程度上还是天赋。如果让您分析自己成功的原因，或者说给文学爱好者提供些建议，您认为有哪些因素？

阿来：当然是天赋。中国人喜欢为了别人的高兴说假话。其实很多问题，如果没有更高深的智慧，反问一下就明白：这方土地又不是养我一个人，我是最不被养育的一群人中出来的；有人说因为写的是西藏题材。很多人也在写西藏啊，仅仅是题材问题这么简单，像念芝麻开门一样念一下就成名了。

但是西藏给我气质性的影响，抹杀同样很难。写作更多地依赖作家的天赋。我相信上帝造人就造成了不同的人。造我们就是写写小说。当然光有土地不够，天赋也不够，还需要不断地提升，提升自己的修持。土地给了你视

野感觉，有经验的文学参与全人类的对话，还要从地域性的眼光超脱出来。

舒晋瑜：地域对您有局限么？

阿来：当然。它让我知道一些事情，也让我不知道一些事情；让我敏感到一些事情，也让我不能敏感到一些事情。

“写作多年以后，我个人似乎对于通常意义上所说那些文学对社会、对生活、对世道人心的作用——或者说意义产生了怀疑。”

舒晋瑜：相对来说，少数民族文学不够发达，是不是也受地域限制？您是藏族作家，能谈谈少数民族文学的现状么？

阿来：到今天为止，造成这种印象有两个原因，首先衡量这个问题的尺度，基本是以汉语的尺度。少数民族作家里也有很好的，比如张承志。还有一部分优秀的作家在我们的视野之外，没有被注意到。另外还有很多作家用本民族的语言创作。占主流地位的批评界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群作家。如果回到母语的环境，用熟悉的语言写作，他们会是另一种情况。

舒晋瑜：您觉得文学的力量对于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来说，有着怎么样的意义？

阿来：写作多年以后，我个人似乎对于通常意义上所说那些文学对社会、对生活、对世道人心的作用——或者说意义产生了怀疑。至于说到个别民族的故事或者说传统失传的问题，在我所属的藏民族来讲，似乎倒不存在这个问题。藏民族的问题，可能更在于走出连续的强大的传统而如何面向现代的问题。我的书写，特别是三部长篇小说的书写，无论是像《尘埃落定》和《格萨尔王》写历史，还是如《空山》以六七十万字的巨大篇幅写现实，都试图寻找一个囿固于传统中太久的民族如何走向现代的问题。

舒晋瑜：无论是主编《科幻世界》，还是创作，对于想象力的要求肯定是第一位的。您如何看待网络时代，人们的想象力反而日益枯竭的现象？

阿来：文学如果有作用，那么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想象力的培植、保持与增长。但今天，中国人的书写因为书写介质的变化，便导致大家容忍想象力的萎缩，容忍审美力的退化，这实在是我无从解读的怪异现象。可能是向下滑行的时候，也有一种特殊的快感？那种失重的快感？回想一下文学史，也经过书写介质的变化：从竹简上的书写变化为纸上的书写。那时，教育没有今天普遍，但文学却并没有经历如此的下降。上升是有难度的，下降是容易的。今天，我们一代以至几代人精神高度的下降确实太匪夷所思了。

舒晋瑜：您在接受访问时曾说，文学创作这种情感损耗对您来讲特别大。您如何在写作中一次次获得情感的新生？

阿来：如今的文学，是市场，是策划了。而我自己呢？写法上、技术上虽然也相当现代。但关于文学的理想，还是古典精神与情怀。我还是觉得文学创作必须融入个人深刻的情感体验，书写中也自然就有巨大的情感投入。所以，写完一部作品，不能马上就进入下一部作品的创作。不是因为没题材，而是经过前一度的写作，觉得情感上空空荡荡，失去了表达的欲望。过去，我用恋爱做比方，有点俗套了。换个比方吧，写作对我就像是一次情感的蓄积，这个过程，就如一个山间湖泊，慢慢被春水盈满。写作相当于这一湖水决堤而出，把所有情感的蓄积挥霍得一干二净。下一本书，我得修好堤坝，等水再次慢慢盈满，再次破堤。一部长篇的写作，特别如此。

舒晋瑜：您现在还写诗么？

阿来：我还是有诗人之心。我小说里有大量的诗歌的因素，甚至就是形式上没有分行的诗歌。叙事文学中小说这种形式包容量更大，把诗歌审美的、对语言精益求精的东西带到小说中来。反过来，诗歌因为过分的纯粹很难包容叙事文学的因素。我想表达的复杂的内容不是诗歌能表现的，用小说来呈现更清晰些。

舒晋瑜：您关注其他描写西藏的作品么？比如《藏地密码》系列也描写